

权力还是声望?*

——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尉建文 赵延东

摘要: 在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定位法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测量方法。该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使用职业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其理论基础是声望的“功能主义”解释,即社会分工导致职业权力分化,由此导致了不同的职业声望。本研究从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出发,论述了社会分层中声望与权力的不一致性,并由此提出计算个体社会资本时,应测量网络中的权力资源而非声望资源。本研究基于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的数据,重新编制了职业权力分数,并将其与职业声望分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基于职业权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无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测算的结果。本研究的结果,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均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职业 声望 权力 社会资本 测量

一、引言

社会资本的概念比较宽泛,学界至今仍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Bourdieu, 1986; Coleman, 1990; Putnam, 1993)。在研究层次上,社会资本存在诸多分歧,但一般来讲,社会资本存在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可以分为“微观/个体社会资本”和“宏观/集体社会资本”两种类型(Brown, 1997)。宏观社会资本强调信任和公共参与等要素;微观社会资本则强调个体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Portes, 1998; Lin, 2001; 赵延东、罗家德, 2005; 张文宏, 2006)。社会网络与社会资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研究”(09CSH045)和“关于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07ASH001)以及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响应系统研究”(2008BAK49B06)的支持。本文曾在“首届社会网与社会资本青年论坛”(2010, 济南)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社会学工作坊(2010, 斯坦福)宣读,并得益于周雪光、边燕杰、Mark Granovetter、Shin Arita、Jon Pedersen 和谢桂华等人的讨论,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本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网络中存在资源，网络本身可以让人达成一种资源。可见资源是所有资本理论、特别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Lin, 2001）。因此，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挖掘出“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

在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中，存在定名法（name-generator）和定位法（position-generator）的区分（Campbell et al., 1986; Lin & Dumin, 1986）。定名法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方法（Wellman, 1979; Marsden, 1987, 1990）。但定名法作为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它的网络边界不易确定，往往会更多地反映强联系、强角色关系或地理限制紧密的联系，忽略弱关系，从而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差（Campbell, 1991）。针对这些问题，林南等人提出了定位法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Lin & Dumin, 1986）。定位法不仅可以测量社会资本中的结构位置，也能够测量网络中的资源，是非常有效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它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这一方法来测量社会资本（Hsung & Hwang, 1992; 傅仰止, 2005; Lin & Erikson, 2008）。

定位法测量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使用网络中职业的声望来计算个体社会资本，这一点也为研究者们所普遍接受和采用（Lin & Dumin, 1986; 边燕杰、李煜, 2001; 边燕杰, 2004）。但这种做法却是值得推敲的。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权力、财富和声望是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尤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以及社会转型时期，权力在社会上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更高的经济回报。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现实感受上看，我们都有理由认为相对于职业声望而言，职业权力可能会更好地反映个体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更好地测量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二、框架定位法与职业声望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优势的隐喻（Burt, 1992）。林南（Lin, 2001）在阐述其社会资本理论之前，先建构了一幅宏观社会结构的图式。这个结构由一系列的位置所组成，根据财富、地位及权力等有标准化价值的资源来排列。从对资源的接触和控制来看，这个结构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的形状：位置越高，占有者的人数越少，在结

构中所拥有的视野就越开阔。金字塔型的结构意味着无论从占有者的人数还是从对位置的接触来说，离顶端较近的位置都具有优势。图 1 具有两层含义：一是e1在社会结构的位置比e2高，他就可能占据和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二是e1可以接触到a1，而且a1的位置比a2高，那么e1比e2就能够动员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测量方法假设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通过对被研究者网络成员中结构性地位的了解，就可以测量出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Lin,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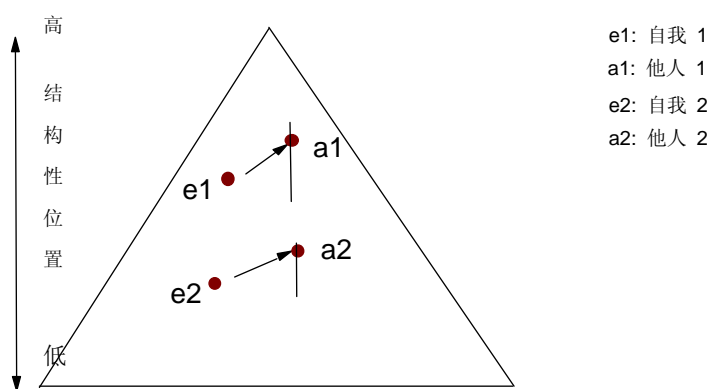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资源的分布及结构性位置的相对性优势

资料来源：林南，2005

林南（Lin, 2001）认为，行动者使用社会关系的三种社会资源类型—财富、权力和声望，是社会资本的内容。每一种资本都有三个共同特征：（1）达高性，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最好资源；（2）异质性，通过社会关系资源可以触及到的幅度；（3）广泛性，可以触及到的位置的数量。后来，边燕杰等人提出的“春节拜年网”（New Year’s Greeter network）方法中，也使用了网顶（达高性）、网差（异质性）和地位资源总量等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边燕杰、李煜，2001；边燕杰，2004）。

既然权力、声望和财富都存在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的特征。那么社会结构中的“高”位应该如何体现？在具体测量社会资本存量

时，定位法选择了使用职业声望^①的分数来计算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达高性、异质性等，实质上就是使用了声望结构特征来取代了财富、权力和声望三者各自的结构特征。因此，本研究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就是：声望结构是否可以有效的代表这三种社会结构特征？声望是否真正具有社会资源的意涵？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声望的研究上来。

三、声望的理论基础与争论

从理论上讲，经济权力和社会声望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造成权力和声望的机制可能不同，权力与声望之间的关系以及“合法性”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讨论的焦点（Zhou, 2005）。社会声望是否如定位法所假定的那样可以直接代表社会资源？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命题。

（一）声望的功能主义逻辑

定位法之所以使用职业声望来计算社会资本，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声望可以很好的代表社会资源。自从诺思和哈特在美国发明了职业声望判断标准量表以来，职业声望已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经济成就的一种尺度。它们的理论基础源于伦斯基对权力和声望的论述。伦斯基认为，声望虽然不是全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特权的一个函数，至少在那些有着充足的剩余产品的社会中是这样（伦斯基，1998）。在此基础之上，职业声望研究的集大成者特雷曼（Treiman, 1976）做了进一步解释：声望高的职业是那些需要较高技术水平，可以对别的个体施加权威或者可以对资本进行控制的职业。不同职业角色功能的专门化，导致各种职业在技术、权威和对资本控制的不同。声望是对权力和特权的承认。由于职业在权力上存在差异，因此职业的特权和声望就会有所不同。因此，这些职业特征在各个社会都会有很高的相关性，特别是在技术、权威、经济权力、财富、收入和声望之间就会存在很高的相关性。换言之，通过职业分化实现的劳动分工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功能必要条件”，并与资源、特权的差异化分配相联系。这

^① 尽管林南（Lin, 2001）一直声称他使用的是比声望（prestige）更具一般意义的声誉（reputation）概念，试图赋予声望更多的资源内涵。但在定位法具体计算社会资本的时候，他依然还是采用了社会分层中普遍采用的职业声望分数。

一论点的核心是权力作用：社会分工导致了权力的不同，而权力导致特权，权力和特权导致声望（Zhou, 2005）。特雷曼的研究带有明显功能主义烙印，其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权力分化→特权→职业声望。

在经验层面，社会分层研究职业等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职业收入和教育进行加权平均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经济量表(Blau & Duncan, 1967); 另外一种是对职业地位的大众评价为基础的声望量表(Treiman, 1977; Grasmick, 1976)。布劳和邓肯通过 1947 年美国大规模抽样调查的研究发现，在 45 种职业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基本上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相一致。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91，这就表明教育和收入两个社会经济变量结合起来大约可以解释总的声望等级变化的 5/6。而且这种职业声望等级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Duncan, 1961; Blau & Duncan, 1967)。这些研究证实了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高度相关性，职业声望的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资源。

（二）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

但关于职业声望的定义、测量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争论。这方面的研究不但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决定性的论断，相反，职业声望的测量结果甚至经常和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相矛盾（Zhou, 2005）。

韦伯早就指出，“与纯粹的经济决定的‘阶级情境’相反，我们希望指明‘地位情境’是一个人生活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决于声望的一个具体的、积极的或消极的，社会估计。”单纯经济的权力，特别是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决不能成为社会名誉公认的基础。权力也不是社会名誉的唯一基础。事实上，社会声誉或声望，甚至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基础，而且往往就是如此（Weber, 1946）。高索普和豪普（Goldthorpe & Hope, 1972）也认为，声望地位评价代表着社会中的各类人群(集体) 对于“意义和价值”的解释，它与经济收入、物质财富的拥有量或权力等级地位高低的测量不同。理论上最大的挑战来自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周雪光（Zhou, 2005）将权力和声望之间的关系看作未解决的问题，质疑了特雷曼关于权力和职业声望之间因果关系的论断。他认为，基本的社会学洞察力认为，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与个人的经济资源或结构位置相关，但又有明显区别。职业声望等级是一种“集体性认知”，这意味着社会判断过程的主体间性产

生了声望。他以此为研究起点，通过一种社会认可的制度逻辑来解释职业声望的等级现象，这种制度逻辑以合法性（legitimac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为中心。他的理论解释逻辑是：合法性和合理→职业声望。

经验层面的研究也一直都在质疑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费泽曼和豪瑟（Featherman & Hauser, 1976）在研究代际流动时得出结论：用职业声望指标来测量职业的社会经济特征“充满了错误”。霍奇（Hodge, 1981）批评邓肯社会经济指数（SEI）测量法的概念意义非常不清楚，至少有三种可选择性解释，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他还转述邓肯的说法“应该清楚，社会经济指数并不意味着像职业声望等级研究中确定的声望等级一样，是对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名录之外类似职业声望等级的预测”。后来的研究表明，邓肯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测量法和声望测量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后来，福克斯的研究以及弗兰德利对邓肯所用数据的重新分析发现，在很多普通和常见的职业中，如店主、农场主、秘书、教师等等，教育程度、工资等级和声望的典型关系并不是那么高。这些发现提醒我们：职业声望绝不等同于社会经济地位，我们都应该考虑他们之间的理论和经验差异（Hauser & Warren, 1997）。

因此，在任何社会中，仅仅靠金钱权力两项并不能最终决定社会地位，人们的主观评价也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即不是有钱者、有权者社会地位就一定高。社会地位的高低，最终还要看民众对此社会群体是否支持、是否尊敬（李强，2000；李春玲，2005）。边燕杰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拜年网的研究中，职业声望最高是科学研究人员95分，在中国声望分有权力的概念，但不完全是权力的概念（边燕杰、李煜，2001）。既然权力分层和声望分层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今中国的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分数之间也不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职业声望分数和职业权力分数之间会存在显著差异。

四、权力及其资源意涵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声望的基础并不一定完全是由权力决定，更多的是由合法性和合理性所导致，并不一定代表丰富的资源内涵。因此，要想体现社会结构位置高低的资源内涵，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对职业的权力分析视角，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从理论上，权力视角更符合社会资本中资源原本的意涵。尽管关于权力的概念存在很多的分歧和争论（伦斯基，1988），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权力的资源意涵。韦伯（Weber, 1946）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或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把自己的意志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别人行为，防止自己的行为被他自己所不愿意的方式所改变的能力。布劳扩大了权力的定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权力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力强加给别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但个人或群体可以通过威慑来这么做。具体包括重复性加强意志的能力和能够截留报酬并对其实施惩罚的能力（布劳，1988）。在伦斯基看来，权力将确定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所拥有的剩余产品的分配（伦斯基，1998）。在韦伯的理解中，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指在结构意义上对资源的一般控制。其他学者（比如埃莫森和库克）也把权力看作是个体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控制资源的可选择来源的程度（Lin, 2001）。综合以上有关权力的经典定义，我们完全可以把权力看作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力强加给他人的能力、一种提供恩惠（favor）的能力。而社会资本关注的是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影响，因此，从理论上讲，权力比声望更能体现社会资本的意涵。

从现实来看，权力与资源的关系也更密切。怀特（Wright, 1997）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表明，专业技能虽然能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但并不带来对资产的控制权或管理权。在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盛行官本位，通过科举制进入权力阶层是当时人们向上社会流动近乎唯一的途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控制着主要资源、财富与机会，通过科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各系统进行分配。当时，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中，处于最上层的是由“国家干部”组成的少数阶层，它们不但得到的各种报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Walder, 1995），还享有更好的社会福利（Parish, 1984）。吉拉斯认为，权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机制，政治忠诚和管理权力是人们步入社会上层的机制。行

政官员不但拥有社会声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政治、行政和管理的权力，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专业人士得不到的物质好处（Djilas, 1957）。魏昂德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路径强调政治忠诚。政治权力和地位决定着人们满足物质利益的特权，这使得国家干部既不同于工人，也有别于企业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Walder et al., 2000）。

市场化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再分配权力，但权力无论在资源控制还是经济回报方面依然得到维系甚至有所加强。边等人的研究表明：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城市中的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使得政治权力得到继续。而且这种继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制度中都有体现（边燕杰，2002）。魏昂德“政府即厂商”的观点”（魏昂德，1996），林南“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林南，1996）的论断以及宋时歌的“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宋时歌，1998），也都证实了权力继续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权力依然是资源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它所反映的资源内涵，会远远大于声望等其他结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来看，权力都比声望更能反映资源内涵，那么在测量嵌入于人们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时，使用权力视角就理应对声望视角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2：职业权力分数比职业声望分数更能反映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

五、数据与测量

（一）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08 年 7—9 月在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城区进行的 18 周岁以上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根据北京市、郑州市和昆明市政府民政或统计部门提供的社区名单（包括各社区的常住人口数），随机抽取 10 个社区（其中，北京只包括西城区和朝阳区两个区；郑州包括中原区、金

社会学研究

水区、管城区和二七区四个区；昆明包括五华区、西山区、盘龙区和官渡区四个区)。第二阶段，确定抽中的社区后，派抽样员与社区领导接洽，拿到社区花名册，在剔除了不符合条件的家户后，再随机抽取出 40 个家户（在拿不到名单或名单不全的社区，抽样员根据建筑物分布画图，然后根据建筑的分布进行编码后，再随机抽取 40 个家户)。第三阶段，在被抽中家庭中用 Kish 表随机抽取一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共发放问卷 13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143 份，有效回收率 84.7 %。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的样本描述

指标	频数 (%)	指标	频数 (%)
性别		职业状态	
男	44.2	在职	49.6
女	55.8	离退休	34.4
		下岗/失业/无业	13.2
		在校学习	2.9
年龄		月收入	
18—29 岁	12.6	800 元及其以下	18.9
30—39 岁	15.9	800—1600 元	32.2
40—49 岁	28.8	1600—3000 元	34.0
50—59 岁	18.8	3000—5000 元	10.3
60 岁以上	23.8	5000 元以上	4.6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未婚	12.5	中共党员	34.6
已婚	78.9	团员	8.1
丧偶	4.2	民主党派	.8
离异	4.4	群众	56.5
教育程度		单位性质	
小学及以下	7.9	党政机关	12.6
初中	20.0	国有企业	32.1
高中	27.3	国有事业	22.2
中专/技校	6.6	集体企事业	8.7
大专	16.8	个体/自雇佣	5.4
本科及以上	21.4	私/民营企业	12.9
		三资企业	2.8
		其他	3.3

(二) 测量

1. “春节拜年网”及其职业分布

本研究使用定位法收集个人网络中的资源信息。定位法的具体测量方法先是对社会中常见的结构性地位（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进行抽样，然后请回答者指出每一个职业地位中是否有与自己熟悉的熟人。定位法不是对内容或角色进行抽样，而是对等级地位进行抽样。它是内容无涉（content free）和角色/位置中立的（role/location-neutral）。定位法测量和计算与结构性位置相联系的数据，而不是测量和计算来自所确定的特定姓名（人）的数据（Lin & Dumin, 1986）。

边燕杰等结合中国现实发展了“春节拜年网”的定位法测量手段，选出 20 种在职业声望上高低不同、且有代表性的职业，要求受访家庭确认他们的拜年交往者中是否属于 20 种职业类别中的任何一种。这些选定的职业虽然不代表全部城市职业，但它们涵盖了城市 80% 的职业和他们样本来源的四个城市中 88% 的职业，体现出各阶层在权力和专业技能上的分化形态（Bian, 2005）。“春节拜年网”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表现出来非常好的适用性（Zhao, 2002；胡荣，2003；王卫东，2006，2009；赵延东，2006）。

本研究延续了“春节拜年网”20 职业的做法^①，询问了受访者在 2008 年春节拜年的对象是否包括我们所列举的 20 种职业。结果发现，在城市家庭的春节拜年网中，工人、中小学教师和司机，依次占据了前三名的位置，分别达到 56.5%、47.5% 和 45.6%。由此可见，城市家庭交往中，城市中传统的职业还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布基本一致。保姆或计时工、饭店服务员和厨师等外来工占据的职业，在城市家庭春节拜年网中的比例偏低，分别是 16.2%、22.6%、23.4%，这也是与现在中国城市社会的状况基本吻合。在社会中上阶层的职业技术阶层（大学教师、法律专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和行政管理阶层（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党政机关领导等）也占有比较大的比例。总体来说，这种职业分布与当前中国的结构大致类似，能够较好的反映中国的职业结构。

2. 职业权力分数与声望分数

边燕杰等人按照城市居民对职业主观评价来计算职业声望分数。城市居民对职业评价分为，“非常好”到“不好”五个等级。其中，“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所有选项的百分比，就是该职业的声望

^① 在边的研究中，有 7 种职业类型的记录人数过少，于是被并入相似职业类别，由此得到 13 种职业，具体参见 Bian, 2005；本研究把“党群负责人”合并到“党政机关领导人”一栏，共有 19 种职业。

分数（边燕杰、李煜，2001，数值见表 2）。本研究采用相同的方法，设计了如下题目来测量职业的权力分数：

不同职业的权力和帮别人办事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如
果将下列二十一种职业所“拥有的权力（影响力）”和“帮
别人办事的能力”分为五个层次，即很有权/能办事=5；比
较有权/能办事=4；一般=3；权力较小/办事能力较差=2；几
乎没有权力/很难帮别人办事=1；说不准=9；请您为每一个
职业打分。

最后根据每种职业的得分合成职业的权力分数，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职业的声望分数与权力分数

职业名称	职业声望分数	职业权力分数
保姆、计时工	6	5
产业工人	20	7
饭店/餐馆服务员	11	6
营销人员	15	9
护士	48	20
司机	25	15
会计	58	34
民警	52	54
厨师/炊事员	24	13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0	73
企事业单位领导	71	72
行政办事人员	53	56
经济业务人员	64	28
科学研究人员	95	42
法律专业人员	86	59
工程技术人员	86	43
大学教师	91	46
中小学教师	77	38
医生	86	57

六、统计分析

我们测量职业权力分数的目的，是希望证明这种测量方法能够比

声望测量法更好地挖掘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内容，从而更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含量。为此，我们首先要对权力分数测量的信度做检验，然后要检验权力分数的测量是否与声望分数测量存在差异，最后还要考察权力分数是否比声望分数有更好的效度。下面我们将就此展开统计分析。

（一）职业权力分数的信度检验

（1）阿尔法系数检验

经检验，中国城市居民职业权力分数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94，这表明该测验具有非常好的同质信度。

（2）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之间的一致性检验

为了更好的检验本研究量表的信度，我们又分别检验了不同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之间的群体，是否对职业权力分数的评价存在差异，结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居民对职业权力评价差异比较

职业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男	女	年轻	中老年	党员	非党员
保姆、计时工	5	7	5	5	6	3*
工人	6	10	5	8	7	7
饭店/餐馆服务员	6	7	6	6	6	6
销售人员	8	10	10	9	9	10
护士	17	23*	21	20	21	19
司机	13	16	13	16	15	13
会计	29	37*	32	34	34	33
民警	50	57*	53	55	55	54
厨师/炊事员	12	14	12	14	13	13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72	74	72	73	73	73
企事业单位领导	72	72	72	71	73	71
行政办事人员	56	55	53	57	57	53
买卖人/商人	27	29	27	29	31	23*
科学研究人员	36	46*	38	43	42	42
法律专业人员	54	63*	54	61*	59	59

社会学研究

工程技术人员	40	46*	37	46*	42	44
大学教师	42	50*	42	48	47	44
中小学教师	34	41*	35	39	38	37
医生	53	61*	56	58	57	59

注：* < 0.05 ；*为更方便比较，40岁级以下看作年轻人，40以上看作是中老年人。

由

表 3 可以发现，不同性别之间对大多数职业的权力分数看法一致，只是对专业技术阶层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的评价比男性高一些。此外，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党员与非党员对绝大多数职业的权力分数看法也是相当一致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量表表现了比较好的内部结构一致性，再次显示较好的信度。

（二）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分数的差异

图 2 反映了不同职业之间声望分数与权力分数的差异情况。由图可见，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之间的很大差异。有 8 种职业，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之间的分数差距超过了 25 分，占到了职业总数的 42.1%。根据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分数的差异，我们大致可以把 19 种职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体力劳动者阶层（保姆/计时工、饭店/餐馆服务员、营销人员、产业工人、厨师/炊事员和司机），他们处在职业声望的低端，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分数差距不大，分数差大多在 10 分之内。二是专业阶层，首先从护士、会计和经济业务人员，职业声望分数与权力分数之间的差距开始变大，分别是 26、20 和 31。职业声望分数与权力分数差距最大的是科学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它们的差距分别是 53、45、43 和 39。三是国家行政管理阶层（民警、行政办事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党政机关领导），他们非常特殊，与其他阶层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他们的权力分数要略高（或等于）声望分数。就总体趋势而言，职业声望分数高于职业权力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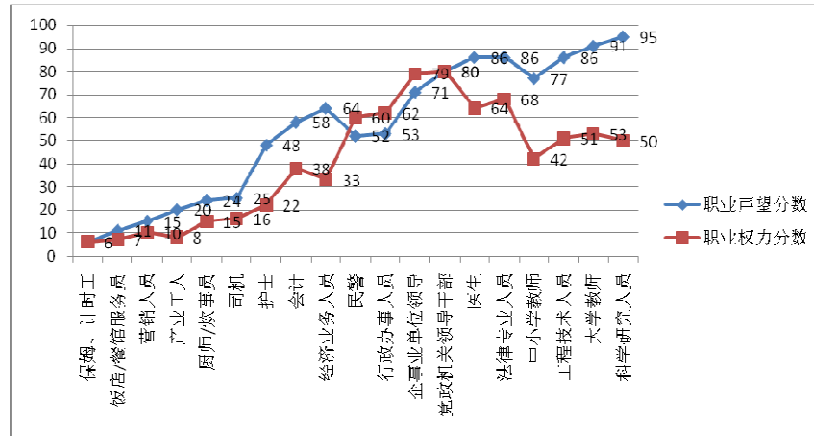


图 2 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分数的差异

我们进一步再看不同职业在声望序列和权力序列中的排名差异。从排名上看，有 12 个职业的排名发生了变化，超过职业总数的 2/3，且有超过一半的职业名次浮动都超过了 3。图 3 按照专业技术阶层、体力劳动阶层和国家行政管理阶层从左到右进行排列。图的左端是专业技术阶层，比如科学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等职业，在职业声望排名中分别处于 1、2、3、7 的位置，而在职业权力的排名中却下跌到 9、7、8、10，排名大幅下降。图中间是大部分是体力劳动阶层，职业权力排名和职业声望排名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图的右面是国家行政管理阶层，民警、行政办事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党政机关领导等职业，职业权力排名与声望排名有了很大变化。在职业声望排名中处于 12、11、8、6 的位置；在职业权力排名中，则分别上升到 6、5、2、1，上升的幅度都在 5—6 之间（具体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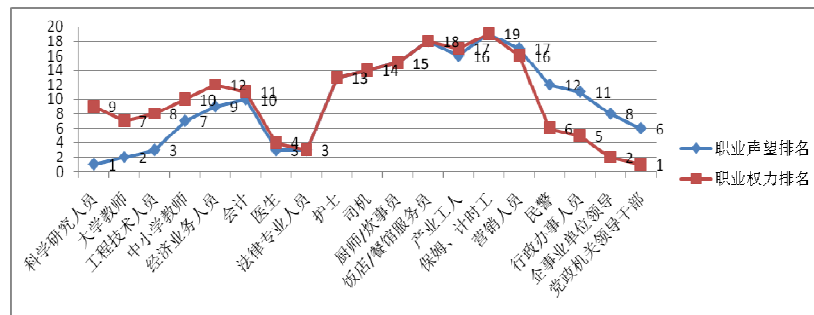


图 3 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排名的差异

最后，我们还计算了两种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将 19 种职业全面考虑进来，则声望分与权力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r 为 0.81，达到 0.01 显著度，说明二者还是有比较高的相关程度的。但如果我们不考虑工人、服务员、保姆、厨师、护士、司机、营销人员等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只考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 11 种职业时，则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仅为 0.13，且无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也再次证明，职业声望分与权力声望分数确实存在差异，尤其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表现更为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 1 得到了支持，职业声望分数和职业权力分数之间的确存在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结构底层的表现不太明显，而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阶层与国家行政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享有声誉但权力地位不高；国家行政管理阶层拥有权力但职业声誉不高。由此可见，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相对集中的社会中上层之间。根据社会资源金字塔似的分布结构，越是在社会结构高的位置，控制和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那么声望和权力之间的差异，对于社会资本测量的意义应该是非常显著的。

（三）对资源的解释能力对比

我们已经看到，权力测量与声望测量之间的确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但权力测量是否比声望测量更好地反映了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含量呢？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指标来比较这两种测量方法的效度。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一个职业资源特征和声望特征的重要指标（Zhou, 2005），以往的研究也都发现了个人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的显著相关（Lin, 2001；赵延东, 2002）。因此，我们选择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作为外在指标和因变量。在社会资本选择上，我们选择了“网顶”，即个人社会网络中位置最高的职业分数（Bian, 2005），分别用职业声望分和职业权力分来测出网顶值，然后分别引入模型分析，以检验职业权力分数和职业声望分数测量出来的社会资本解释力的差异^①。表 4 所反映的是影响收入的嵌套模型（在此，我们排除了

^① 社会资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都是社会资本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都没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Lin & Erickson 2008）。大多数社会资本议题的研究，跟本研究一样使用的都是横截面数据，故对社会资本与收入因果关系的问题无法做出回答。但因果关系问题并非本研究的重点，而且只有能够证明社会资本对收入有影响，那么因果关系问题就不会影响到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离退休的个案)。模型 1 是基准模型,分析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教育和社会阶层对收入的影响。模型 2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以职业声望分测出的网顶。由表可见,在加入职业声望网顶之后,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提高,而且声望网顶的作用显著。模型 3 则是把权力网顶和职业声望网顶同时纳入模型^①。可以看到,加入权力网顶后,模型 3 中的声望网顶的回归系数降到 0.006 且不再显著。而权力网顶的回归系数是 0.122,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权力网顶比声望网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②。另外,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模型 3 比模型 2 的拟合程度更好,而且 F 值的改善显著的。从这些统计结果可见,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 2 也得到了支持,由职业权力分数测量出来的社会资本,比用职业声望分数测量出来的社会资本具有更强的资源意涵。

表 4 网顶对城市居民家庭月收入对数的影响 (OL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社会资本			
声望网顶	—	0.142***	0.044
权力网顶	—	—	0.122**
控制变量			
性别	0.197***	0.183***	0.188***
年龄	0.007*	0.007*	0.006*
政治面貌(非党员为参照)	-0.019	-0.013	-0.008
教育程度	0.132***	0.117***	0.111***
社会阶层(非技术公认为参照)			
技术工人	0.312	0.373*	0.378*
专业技术人员	0.714***	0.751***	0.742***
普通职员	0.105	0.149	0.131
经济管理人员	0.499***	0.501***	0.484***
行政办事人员	0.476***	0.566***	0.556***
行政与事业领导	0.789***	0.820***	0.802***
常数项	6.09***	6.125***	6.197***
样本总体	474	474	474
调整后 R ²	0.225	0.242	0.248
F 值	14.75***	11.47***	4.37**

注: (1) 在纳入模型时, 权力网顶和声望网顶均作标准化处理;

(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① 职业权力网顶和声望网顶的相关系数为 0.71, 且模型 3 中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3, 说明模型无明显共线性问题。

^② 如果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引入权力网顶和声望网顶建立两个独立模型, 则声望网顶和权力网顶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42 和 0.153, 权力网顶的作用仍比声望网顶更大。

七、小 结

社会资本测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有效的反映出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在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中，定位法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可且非常有效的工具。本研究针对定位法中使用职业声望计算社会资源的做法提出改进方法。本研究认为，权力和声望尽管一定程度上相关，但彼此具有独立性，而且声望来源于社会的认可，并非必然与社会资源联系起来，而权力在中国社会与资源的联系更为密切。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使用职业权力分数来测量社会资本的做法。

我们假设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职业权力分数会比声望分数更好地测量出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含量，并使用基于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结果支持了我们的两个研究假设。首先，职业声望与职业权力的确存在很大差异。两者最大的差异体现在权力阶层和知识阶层上。知识阶层的社会声望很高，权力阶层较之较低。但权力阶层的权力分数特别高，知识阶层较之则低很多。社会底层并不存在很大差异，无论是职业声望和职业权力都比较低。其次，通过对于职业权力分数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发现较之职业声望分数，职业权力分数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

本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套新的个体社会资本测量分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测量中国人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本，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也有一定启示。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今中国社会，权力与声望存在着相互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社会分层研究中“权力延续论”的观点。当然，本研究是以中国城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调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边燕杰、李煜，2001，《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
- 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 彼德·布劳，198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傅仰止，2005，《社会资本的概念化与运作：论家人重迭网络中的“时间投资”机制》，《台湾社

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第9期。

格尔哈斯·伦斯基著，关信平等译，1988，《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胡荣，2003，《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社会学研究》第5期。

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国外社会学》第5-6期。

——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春玲，2005，《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强，2000，《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宋时歌，1998，《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王卫东，2006，《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与个人资本》，《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09，《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社会》第3期。

魏昂德，1996，《作为工业厂商的地方政府》，《国外社会学》第5-6期。

张文宏，2006，《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延东，2002，《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06，《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赵延东、罗家德，2005，《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的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Bian, Yanjie 2005, "Occupation, Cla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83(4).

Blau, Peter &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Brown, Thomas Ford 1997,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apital." Working paper located in <http://hal.lamar.edu/~BROWNTF/SOCCAP.HTML>.

Ronald S. Burt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K, Marsden, P & Hurlbert, J. 1986,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s* 8(1).

Campbell KE, Lee BA. 1991, "Name generators in surveys of person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3.

Coleman, Jame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of Power*. New York: Praeger.

Duncan, O. D. 1961,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In J. Reiss, Jr. (ed.),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New York: Free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 Robert M. Hauser 1976, "Prestige or Socioeconomic Scales in the Study of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4.
- Goldthorpe, John & Heith Hope 1972, "Occupational Grading and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Keith Hope (e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smick, H. G. 1976, "The Occupational Prestige Structure: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pproac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7.
- Hodge, Robert W. 1981, "The Measurement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0.
- Hsung, R. M. & Y. J. Hwang 1992, "Job Mobility in Taiwan: Job Search Methods and Contacts Status". Paper presented at Sunbelt X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Networks, San Diego, the United States.
- Lin, Nan. 2001,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Nan Lin, Karen Cook & Ronald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Y: Aldine DeGruyter.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an & Dumin, Mary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 8.
- Lin, Nan & Bonnie Erickson 2008,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1990,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 Robert M. Hauser & John Robert Warren 1997, "Socioeconomic Index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 Review, Update, and Critique." in Adrian Raftery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 Parish, William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ames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eiman, Donald J. 1976, "A Standard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for Use with Historical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7.
-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Walder, Andrew, Bobai Li &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Wright, Eric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ax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llman, B.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Zhao, Yandong 2002, "Measuring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Laid-off Chinese Workers." *Current Sociology* 50.

Zhou, Xueguang 2005,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Ranking: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Reanaly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尉建文）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赵延东）

责任编辑：闻翔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